

向「陸」還是向「洋」？

——對〈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的再思考

• 吳征宇

摘要：針對近來中國向海洋發展所面臨的壓力和所遭遇的挑戰，中國國內媒體出現了一種「戰略對沖」的主張。這種戰略主張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是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的高柏教授，他認為中國通過高鐵建設可以營造一種整合歐亞大陸經濟體的陸權戰略，從而與「藍海戰略」形成戰略性對沖。本文認為，以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為核心的陸權戰略風險很大，不僅跟不上當前全球政經格局的變化，也無助於規避中美兩國間現有的戰略矛盾或衝突，而且這種「對沖戰略」一旦實施，極有可能導致中俄關係及中國與中亞國家關係的複雜化，從而給中國帶來得不償失的結局。近年來中國面向海洋發展所遭遇的挑戰實屬正常現象，從根本上說並不意味着中國今後應當暫緩面向海洋的發展，而恰恰意味着中國需要正視這種發展戰略所面臨的問題，並進而在此基礎上完善中國面向海洋發展的路徑。

關鍵詞： 高鐵 海權 陸權 大戰略 中國外交

針對近年來中國面向海洋發展遭遇到的壓力和挑戰，中國國內媒體出現了一種「戰略對沖」的主張，其主要倡導者之一是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的高柏教授。他於2011年3月11日的《經濟觀察報》發表了〈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一文^①。高柏認為，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調整，預示着中國的「藍海戰略」已經走到盡頭；金融危機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出口市場，這種破壞即使在危機平息後也很難恢復；美國重返亞太則不僅導致了中國周邊局勢複雜化，而且也將使中國主導的東亞經濟一體化難以實現。據此，高柏指出，鑒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短期內無法實現轉型，因此中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而高鐵則為突破現有困境提供了一條現實途徑：高鐵的發展不僅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從而防止全球化的逆轉並為國內經濟轉型贏得時間；而且可以幫助中國建立戰略上的對沖態勢，從而使中國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處於有利的位置。

高柏指出，高鐵的發展不僅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從而防止全球化的逆轉並為國內經濟轉型贏得時間；而且可以幫助中國建立戰略上的對沖態勢，從而使中國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處於有利的位置。

* 本文是筆者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馬駿先生討論的成果，筆者在此基礎上對原有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和補充，在此謹對馬駿先生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幫助表示感謝。

高柏強調，地理上陸海兼備的特點賦予了中國進行戰略選擇的主動權：如果海洋方向出現問題，中國可以向西發展，致力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如果歐亞大陸出現問題，中國便可以選擇東進，致力於環太平洋的經濟整合。

高柏此文雖然表面上討論高鐵的發展，但其重要性實質上已經遠遠超出了交通行業發展戰略的範圍。他的戰略主張，從根本上說不僅涉及到當下的中國應當如何突破現有的經濟轉型困境，同時更涉及到中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對自身長遠戰略發展方向的選擇。

毫無疑問，這一「對沖戰略」對當下正處於嚴峻壓力下的中國來說，確實具有很強的誘惑力。這種主張如果變成現實，那麼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無疑將會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處於「左右逢源」的有利位置上。但問題是，此文主要立足於高鐵對中國內地經濟可能起到的整合作用，而在筆者看來，高柏據此提出的戰略主張卻並不具備乍看起來似乎具有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這種主張即使能夠實現，也無法幫助中國擺脫現有的困境。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鐵路的出現和發展確實對大陸國家的權勢增長起到過重要作用，但這一點並不足以讓人們將鐵路的作用絕對化。事實上，即使在鐵路出現一個多世紀後，高柏提到的「心臟地帶」（包括俄國歐洲部分在內的中東歐地區）仍然是當今相對落後的地區。由於高鐵與現代鐵路相比並沒有實質性的代差，因此高鐵是否真的具有「整合歐亞大陸經濟」的效力，是值得質疑的。除高鐵的經濟效用外，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以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為核心的陸權戰略能否真正起到「對沖」作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涉及到三方面內容：一、陸權戰略是否有助於規避中美兩國間的戰略矛盾或戰略衝突？二、以高鐵為支柱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會對中俄關係產生何種影響？三、中國大舉進軍中亞將會在戰略上產生出哪些可能的效應？鑒於「對沖戰略」關係到未來中國的長遠發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對這一戰略主張的合理性進行系統的探討和分析，並且爭取在這個基礎上明確中國在應對海洋壓力方面應該採取的路徑。

「對沖戰略」涉及的首要問題，在於以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為核心的陸權戰略是否真的有助於規避中美兩國間現有的戰略矛盾或戰略衝突，而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則關乎對美國的戰略利益及當前中美戰略矛盾性質的判斷。

一 陸權戰略與美國對華疑懼

「對沖戰略」涉及的首要問題，在於以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為核心的陸權戰略是否真的有助於規避中美兩國間現有的戰略矛盾或戰略衝突，而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則關乎對美國的戰略利益及當前中美戰略矛盾性質的判斷。

與歷史上的英國一樣，作為主導性海洋強國兼國際體系領導者，美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主要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歐亞大陸核心區域（歐洲和東亞）的均勢；二是其在全球範圍的經濟、技術和軍事上的領先優勢。在現代世界歷史上，國際體系領導者無一例外地都是當時的主導性海洋強國，除保持經濟、技術和軍事上的領先優勢外，保持歐亞大陸核心區域的均勢歷來是它們用以維護其權力優勢的重要手段。首先，一旦某一個強國取得歐亞大陸核心區域的霸權，那麼它將會獲得必要的資源，從而有能力對主導性海洋強國兼國際體系領

導者的地位發起挑戰，這也是為甚麼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兼國際體系領導者總是在針對霸權覬覦國的制衡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次，它也將有能力使整個大陸市場對主導性海洋強國兼國際體系領導者完全封閉，而後者為了保持自己在一個開放性體系中所能獲取的既得利益，則要求體系中的核心區域在政治和經濟上依然保持對自己及追隨者的門戶開放^②。

對美國來說，儘管現代技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已經消除美國遭受入侵的可能性，但一個控制了歐洲或東亞的霸權國家，仍然有能力威脅到美國作為國際體系領導者的地位。首先，美國的價值觀無法在一個強敵環繞的環境中得以維繫，因為歐亞霸權國的挑戰有可能使美國淪為一個兵營國家或堡壘國家；其次，美國的自由和繁榮必須依賴當今世界的核心區域（尤其是歐洲與東亞）對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門戶開放，而歐亞大陸核心區域內任何霸權國家的興起，都將有能力讓這些區域對美國完全封閉^③。正因為保持歐亞大陸核心區域（歷史上主要是歐洲但現在也包括東亞）的均勢直接關係到主導性海洋強國兼國際體系領導者的權力優勢，因此無論是歷史上的英國，還是當今的美國，都同樣將保持歐亞大陸核心區域的均勢看作其根本利益所在。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對當今中國崛起的警惕和防範，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緣於中國的權勢擴張或海軍力量的增長對美國本土或海上通道的安全構成了實質性威脅。誰都清楚，在可預見的將來，基本上並不存在中國海軍在任何大洋上擊敗美國海軍的可能性。當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懼，主要是針對中國崛起可能產生破壞歐亞大陸（尤其是東亞）均勢的後果。冷戰後的中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迅速崛起，中國在亞洲大陸及瀕外海（第一島鏈內的海域）的天然優勢，以及當今亞洲大陸權力結構的嚴重失衡，不僅是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疑懼及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的癥結所在，而且也是導致2010年以來中國與美國及周邊鄰國關係複雜化的根本因由，而這一點同樣也正是近年來美國對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表現出如此深切關注的原因^④。

在此應當特別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發展海上力量的密切關注，並不是因為中國已經具備與美國爭奪大洋霸權的能力。美國對中國海上力量（包括與爭奪第一島鏈制海權相關的反介入能力）的主要擔心，是這種發展將大大降低美國有效干預東亞區域（包括瀕外海）事態發展的能力（這種干預能力對美國防範中國擴張及保持其在東亞的雙邊同盟體系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中國出於「戰略對沖」的目的經營中亞，以及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計劃順利實施，這不僅將導致中國在中亞經濟影響力的上升，且將使中國獲得在中亞施加其政治影響力的有力槓桿，其後果無非是造成中國在大陸上的優勢更為鞏固，歐亞大陸權勢失衡的格局將會更趨嚴重^⑤。

中國在歐亞大陸地位的鞏固與美國力圖維護大陸均勢運作的意願，不僅難以兼容，甚至針鋒相對。拿破崙的法國和希特勒的德國都曾在吸取路易十四（Louis XIV）和威廉二世（William II）向海洋發展的失敗教訓後轉而向大陸擴張，但結果卻如出一轍。從這種由大陸戰略造成的海洋後果（海洋國家不會容許任何一個強國破壞大陸均勢及對其構成有力挑戰）的經驗看來，中國非但無法通過向

美國對中國海上力量的主要擔心，是這種發展將大大降低美國有效干預東亞區域事態發展的能力。如果中國出於「戰略對沖」的目的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計劃順利實施，歐亞大陸權勢失衡的格局將會更趨嚴重。

中亞的發展來規避與美國在海上的戰略衝突，甚至可能激化中美兩國間日趨深化的戰略矛盾。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在東亞的核心目標，基本上是在防止中國成為陸上強國以及一個有能力動搖美國在西太平洋地位的海上強國。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在戰略上防範中國擴張的努力，既可以着眼於海上，同時也針對中國漫長的陸上邊界。如果中美戰略矛盾進一步深化，那麼美國未來對中國將可能採取某種類似其針對蘇聯曾經採取過的戰略，即通過在蘇聯周邊建立一系列盟國來遏制和削弱蘇聯的權勢，這種戰略同盟將會對目前美國在東亞的雙邊同盟體系構成有效補充。

在理論上，美國對中國的擔心並不是中國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發展，這種發展只會是加強而非削弱中國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依賴，這也是自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戰略目標之一。從長遠看，美國對中國的潛在擔心是中國將會在海洋方向採取守勢，轉而在大陸上採取攻擊性的政策，從而建立起一個美國無法施加重大影響的封閉性勢力範圍。有鑒於此，美國在中國周邊的經營，不僅是一種對中國向海洋(東南亞)方向擴張的防範，而且是一種對中國轉向大陸擴張的防範。這兩種防範都將使未來的美國可能將戰略重點集中在那些與中國相鄰的國家或地區上，尤其是印度、俄國和中亞。

冷戰的結束及俄國的相對羸弱恢復了俄國作為心臟地帶強國與主導性海洋強國(美國)在根本戰略利益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的核心是防止另一個邊緣地帶強國的崛起及其帶來的挑戰，因為這種挑戰將會使美國和俄國面臨巨大壓力。

二 心臟地帶強國戰略上的兩重性

「對沖戰略」涉及到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在於以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為核心的陸權戰略將會對原本就是非常脆弱的中俄關係產生何種影響。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俄羅斯作為心臟地帶強國在戰略上特有的兩重性。

作為心臟地帶的大陸強國，俄國的戰略屬性實際上是雙重的：一方面，作為歷史上草原游牧民族的直接繼承者，俄國特有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夠通過不斷向外擴張從而使邊緣地帶國家面臨巨大壓力；但另一方面，只要俄國本身不打算在邊緣地區建立某種霸權，那麼它也是保衛和平最有效的大陸根據地。這一戰略上的兩重性意味着，只要俄國放棄建立一個歐亞帝國的夢想，那麼俄國與主導性海洋強國在根本的戰略利益上應該是一致的。這一點同樣也為歷史所證明，因為歷史上的英國及後來的美國非但沒有與俄國爆發過大規模的直接衝突，反而總在針對邊緣地帶強國(如德國)稱霸企圖的戰爭中結為盟友。如果從心臟地帶強國戰略上的兩重性來推斷，那麼冷戰的結束及俄國的相對羸弱也可以說正是恢復了俄國作為心臟地帶強國與主導性海洋強國(美國)在根本戰略利益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的核心是防止另一個邊緣地帶強國的崛起及其帶來的挑戰，因為這種挑戰不僅將會使美國面臨巨大壓力，同樣也會使俄國面臨類似的壓力^⑥。

實際上，從冷戰結束前後俄國對歐洲一體化及其東擴的反對中便可以看出俄國的這種擔心。冷戰時期蘇聯的西歐政策有兩條思路，即反對美國在西歐的軍事存在，以及西歐通過一體化的方式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這兩條思路在冷戰背景下並不很明顯；但冷戰結束後，俄國對歐盟東擴的反對不再像冷

戰時與它對美國的反對關聯在一起。俄國反對美國實質上是為防止出現一個將俄國排斥在外的統一的歐洲，這種「反美政策」本身並沒有包含稱霸企圖，而是為了避免一種新的不平衡的出現。與此相類似，俄國對冷戰後東亞的獨立權力中心的崛起也同樣是懷有警惕的：中亞和遠東對俄國的意義類似於拉美地區對美國的意義。二戰時期蘇聯對日本的政策及其在冷戰時期不惜代價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實際上也正是這種警惕的體現。與這種警惕相對應，當下俄國對中國崛起的擔心應該不下於美國。鑒於中亞和遠東歷來是俄國的軟肋，因此單純就中國因人口總量產生的內在張力而言，就會在俄國人心中構成潛在的威脅。

與面向大西洋的歐洲國家一樣，中國是個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國家」，即一個瀕臨開放性海洋且背靠較少自然障礙陸地的國家。這類國家在戰略上總會面臨向「陸」還是向「海」的兩難處境，且同時由於其必須面對陸海兩方面的壓力，因而也具有雙重的易受傷害性。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之所以長期積貧積弱，很大程度上在於同時遭到來自大陸和海洋兩方面的壓力。近代以來的中國只在兩個時期得以暫時迴避了這種戰略上的兩難局面：一是1950年代中蘇同盟時期，二是自1990年代蘇聯解體至今，這也是中國近年來之所以能夠集中精力向海洋謀求發展的前提。從宏觀歷史角度看，盡可能地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係，不僅對中國推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而且對中國避免重蹈戰略上受到陸海兩方夾擊的局面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戰略意義；尤其當下中國在海洋方向上面臨重大的戰略壓力和挑戰時，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係對中國而言，則更是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重要性。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推行以高鐵為紐帶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前提，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以損害中俄關係為代價的；這也意味着，中國為推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而大舉進入中亞，如果不能夠爭取到俄國的支持（或至少默許），則不僅成本與風險極大，而且失敗的可能性也極大。然而，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很難想像俄國會聽任中國大舉進軍中亞，因為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上升，客觀上將造成俄國影響力的下降，甚至將減少俄國在能源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即便俄國可能不具備與中國在中亞展開經濟競爭的實力，但這並不意味着俄國將會對中國進軍中亞聽之任之。客觀地說，中國主導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對俄羅斯的意義，有點類似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對中國的意義，這兩種經濟整合都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和政治效應。有鑒於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中國真的大舉進軍中亞，不僅可能造成中俄關係的複雜化，而且可能造成中俄爭奪中亞的態勢，其結果甚至可能在無意中促成俄美兩國在某種程度上的聯合。

歷史提供的經驗證據表明，兩個大陸強國間關係的脆弱度，通常都遠高於一個大陸強國與一個海洋強國間關係的脆弱度，這一點與海洋國家在軍事實力和利益上的特性密切相關。首先，由於歷史傳統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海洋強國一般都不會維持一支強大陸軍，這使它很少能夠對其他大國的生存構成威脅。唯有集結在、威脅集結在或有能力集結在一國邊境的陸上力量，才能以強大的經濟和技術實力無法做到的方式來威脅他國生存，當今美國基本上做不到這一點^⑦。其次，當

近代以來的中國只在兩個時期得以暫時迴避了戰略上向陸還是向海的兩難局面：一是1950年代中蘇同盟時期，二是自1990年代蘇聯解體至今，這也是中國近年來能夠集中精力向海洋謀求發展的前提。

今美國霸權地位能否持久的關鍵，在於它能否持續保持自己在主導性經濟、軍事及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但這種優勢本質上無法通過軍事手段獲得。儘管美國往往有能力將自身意志強加於弱小國家之上，但它一般都是以其他方式(如外交、經濟)而不是赤裸裸的軍事力量來做到的，對國際體系中的強國而言則更是如此^⑥。

自冷戰結束以來，儘管中美關係麻煩不斷，但兩國卻表現出相當的耐力和韌性，這不僅與中美經濟上的互補性有關，而且與兩國國力和利益上的差異密切相關。但是，導致中美關係柔韌性的因素在中俄之間卻根本不存在。中俄兩國不僅在經濟上缺少互補性，而且國力和利益上也有着驚人的相似性。中俄關係本質上是兩個相鄰大陸強國間的關係，而且俄國有能力在中俄邊界陳兵百萬。

如果中國加大對中亞的經濟滲透，為維護在政治和戰略上的獨立性，中亞國家很可能會選擇強化與其他強國的戰略合作來對沖經濟上依賴中國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即中國進軍中亞可能在中亞地區促成新的「政經分離」局面。

三 「歐亞聯盟」與中亞的戰略地位

「對沖戰略」涉及的第三個問題是：如果中國大舉進軍中亞，在戰略上將產生哪些可能的效應？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首先必須破除近年來一直困擾中國對外政策的一個嚴重誤區，即經濟發展的政治效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長的態勢，這種增長不僅為中國崛起提供了堅實基礎，而且為中國對外政策提供了有力武器；可以說，當代中國外交取得的重要成就，都與當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着或多或少的內在聯繫。然而，世界上極少有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國際政治中也不存在任何情況下都行之有效的政策。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及由此造成的市場繁榮，雖然為中國擴大在東亞的政治影響力提供了有力槓桿，但是以經濟優勢謀求政治影響力的努力本質上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了這個限度，那麼就可能產生適得其反的後果。

近年來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區域內出現的「政經分離」的趨勢，已經非常形象地證明了這一點。當今的東亞國家在政治和戰略上對美國的依賴，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為了抵消它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而產生的政治後果，即東亞國家與中國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愈是深化、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愈加強，它們對美國在政治和戰略上的依賴程度也就會愈嚴重。而這一點同樣也適用於中亞國家，即如果中國加大對中亞的經濟滲透，為維護在政治和戰略上的獨立性，中亞國家很可能會選擇強化與其他強國的戰略合作來對沖經濟上依賴中國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即中國進軍中亞同樣可能在中亞地區促成新的「政經分離」局面。中國與周邊國家間「政經分離」的趨勢，嚴格地說並不算是出乎意料之外，這種形式的分離實際上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國家在其與強鄰交往中出於生存本能都會做出的一種正常反應。

從戰略上看，作為一個陸海複合型強國，中國可能進行政治、經濟擴張的方向實際上有兩個：一是東南亞，二是中亞。這兩個地區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愈來愈仰仗中國鼻息；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地區自冷戰結束後一直都處於某種權力真空狀態。

東南亞地區雖然在文化和經濟上與中國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隨着美國近年來重返東南亞的努力，以及隨着印度和日本這兩個潛在大國不斷地拓展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真空正在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填補，這也是美國近來不斷在東南亞地區挑起事端和鼓動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進行對抗所力求達到的根本目的。與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相比，其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歷來有限，中亞地區傳統上一直是俄國的勢力範圍，但冷戰後俄國的持續羸弱卻使得中亞地區的權力狀態出現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僅是由於中亞地區歷來是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活動範圍之一，同時也更在於中亞地區的豐厚資源對當今正處於高速發展中的中國產生的巨大誘惑力。

與美國重返東南亞相對應，俄國也正在加快重返中亞的步伐：2011年10月3日，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京(Vladimir V. Putin)在《消息報》發表文章，提出了要建立「歐亞聯盟」的設想；11月1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三國間簽訂了一項正式協議，計劃到2015年要正式建立「歐亞聯盟」。普京倡議建立的「歐亞聯盟」絕不會是一個單純的經濟聯盟，其政治涵義顯而易見。「歐亞聯盟」一旦成型，中國的北部邊境將出現一個類似前蘇聯那樣的政治經濟實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俄國的所作所為與美國近年重返東南亞的努力，是兩個性質幾乎完全相同的戰略舉動。俄國為填補中亞地區權力真空採取的這些舉措，意味着中國非但無法以歐亞大陸經濟整合來對沖美國在海洋方向上的巨大壓力，反倒有可能激起俄國的強烈反彈。

事實上，只要對「歐亞聯盟」的建立可能造成的後果稍作推測的話，便不難理解為甚麼中國無法進軍中亞。籠統地說，「歐亞聯盟」的建立對中國將會造成兩方面的消極後果：一是將嚴重限制中國從中亞地區獲得能源的自由度；二是可能實質上掏空「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的影響力。

當代中國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使中國對外部能源的依賴程度愈來愈大。儘管當今中國的主要能源進口地是中東，但中東國家的政治局勢複雜，並且與美國保持着密切聯繫；更重要的是，中國進口石油的海上通道控制權掌握在美國手中，所有這些都意味着中亞和俄國對確保中國的能源安全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俄國主張的「歐亞聯盟」一旦成型，意味着中國今後想要從中亞地區獲得能源，可能將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代價。中俄兩國的能源博弈，其重點實質上就是在中亞國家，只要中國能夠從中亞國家以更低廉的價格獲得能源，俄國便無法在能源問題上與中國叫板；一旦俄國與中亞國家在能源問題上形成了一致立場，最大受損者將是中國。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之一，是主導建立了包括俄國和中亞四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上合組織，但中亞四國也都是「歐亞聯盟」旨在爭取的實在或潛在的成員國。由此不難想像，「歐亞聯盟」一旦形成，不僅將嚴重削弱中國在上合組織的領導地位，甚至將使之空心化。「歐亞聯盟」實質上是俄國對上合組織採取的一種戰略對沖，因為對俄國而言，中國在上合組織的主導地位可能成為中國擴大在中亞影響力的工具。簡言之，推動「歐亞聯盟」的形成並不說明俄國將要與中國為敵，但卻

「歐亞聯盟」實質上是俄國對上合組織採取的一種戰略對沖，因為對俄國而言，中國在上合組織的主導地位可能成為中國擴大在中亞影響力的工具。推動「歐亞聯盟」的形成是俄國對中國的崛起採取的一種防範戰略。

是俄國對中國的崛起採取的一種防範戰略。因此，如果中國推進以高鐵為紐帶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那麼不僅可能在中亞地區造成新的「政經分離」的格局，甚至可能使中亞地區演變成新的冷戰前沿。

高柏提出的那種認為陸海兼備的特點賦予了中國進行戰略選擇主動權的看法，從根本上說乃是以美俄矛盾不可調和為前提的，但既然1970年代的中國可以因為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大膽地衝破意識形態的束縛，與美國改善關係，那麼我們也不能想當然地假定未來的俄國就永遠不會因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與美國站到一起。

四 中國和平發展的應有路徑

與保持陸海兩方面平衡相對應的是，中國必須在此基礎上確立起主導性發展方向。近現代世界史提供的經驗表明，陸海複合型強國的主要出路，是在確保陸上疆界穩定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向海洋謀求發展。

作為一個陸海複合型強國，中國在長遠戰略發展方向的選擇上必須注意兩個彼此間相關聯的問題：一是中國在戰略資源分配上必須要在陸海兩個方向上保持恰當的平衡；二是在保持陸海平衡基礎上必須確定自身長遠的主導性發展方向。

與單純的大陸國家或海洋國家相比，陸海複合型強國戰略上普遍有一些明顯弱點：一是戰略選擇上面臨陸海兩難；二是容易受到來自陸海兩方面的雙重壓力；三是服務於國家大戰略目標的資源分配容易分散。近五百年以來，正是陸海複合型國家特有的弱點和制約，才使得中國幾次與強大的機會失之交臂。儘管在冷戰後陸上疆界的穩定使中國有可能集中精力向海洋發展，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作為陸海複合型強國的戰略弱點就此消失了。實際上，未來的中國要確保長治久安，同樣也必須在陸海兩方面保持恰當的平衡，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必須約束在大陸方向上的行為，以此確保中國與陸上強鄰（尤其是俄國）關係的穩定。

與保持陸海兩方面平衡相對應的是，中國還必須在此基礎上確立起主導性發展方向。近現代世界史提供的經驗表明，陸海複合型強國的主要出路，是在確保陸上疆界穩定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向海洋謀求發展。這條道路的可行性已經為中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所證明；即使以高鐵為紐帶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最終能成功，恐怕也無法取代向海洋發展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應。就經濟效益而言，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恐怕無法取代中國目前在許多方面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也無法取代中國對非洲和拉美這些欠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就社會效應而言，向海發展與向陸發展在中國國內產生的社會效應可以是迥然不同的。這兩種發展方向實際上將涉及到中國國內不同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這種消長對中國國內政治生態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

的確，近年來中國在發展海洋方面確實遇到一系列重大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意味着中國就此應放棄面向海洋的主導性發展方向，而是意味着中國必須盡可能地優化和完善現有的發展路徑。這方面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應對伴隨着中國外向型發展而來的、來自主導性海洋強國與周邊鄰國的雙重壓力。現代歷史上的陸海複合型強國的海洋轉型（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國與威廉二世的

德國)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雙重壓力導致的結果,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由於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強國在防止邊緣地帶陸海複合型強國的崛起上存在明顯的共同利益。

當今中國在外向發展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克服來自周邊鄰國的壓力,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是中國近來在東海和南海的主權問題上遭遇的一系列挑戰。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表明無意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但這種說法針對的乃是全球均勢而不是區域均勢,而後者才是周邊鄰國關注的核心。從嚴格意義上說,有效消除周邊鄰國之猜疑和壓力的根本手段之一,就是要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區域性的國際制度,中國在此過程中需要加以明確的問題,不僅是必須主動塑造能夠對自身及鄰國形成約束力的區域性制度,而且要容許區域外強國(主要是美國)參與,因為如果沒有區域外強國的保障,中國根本無法與鄰國(尤其是二等強國及其他小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制度機制。

當今中國外向發展中要克服的另一問題,是如何應對主導性海洋強國兼國際體系領導者的壓力。除實力上的領先外,主導性海洋強國相對於崛起中強國的另一優勢,是它們在防止邊緣地帶陸海複合型強國的崛起上,與這類強國的鄰國間存在許多共同利益,這也是歷史上主導性海洋強國之所以能夠多次成功構建大同盟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戰略上的優化外,中國應對這類壓力時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努力塑造一種真正具開放性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國際秩序;主導性海洋強國的核心利益,就是必須保持歐亞大陸核心區域對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相對開放,為此,中國可能不僅要容許主導性海洋強國參與區域性制度的塑造,而且必須確立一種具有真正開放性的意識形態。

有效消除周邊鄰國之猜疑和壓力的根本手段之一,就是要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區域性的國際制度,中國不僅必須主動塑造能夠對自身及鄰國形成約束力的區域性制度,而且要容許區域外強國參與。

註釋

- ① 此文與很多相關文章和資料收入高柏等:《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本文未註明出處的引文均出自該文,參見頁1-19。
- ②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 1494-1945*, trans. Charles Fullma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166, 263.
- ③ Walt W. Rosto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an Essay in Recent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543, 544.
- ④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2), 22.
- ⑤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7.
- ⑥ 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 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10, no. 4 (1991): 356.
- ⑦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135.
- ⑧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no. 1 (1953): 12.